

湖湘

余嘉锡 著 戴维 校点

四库提要辨证

①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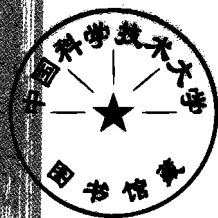
文庫

余嘉锡 著 戴维 校点

四库提要辨证

①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湖南教育出版社



湖湘文库
甲编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

顾 问	张春贤	周 强	杨正午	周伯华	胡 彪
	肖 捷	许云昭	戚和平	谢康生	文选德
	孙载夫				
组 长	蒋建国	路建平			
副组长	郭开朗	王汀明			
成 员	李友志	钟万民	姜儒振	魏 委	吴志宪
	刘鸣泰	朱建纲	龚曙光	周用金	朱有志
	王晓天	钟志华	刘湘溶	肖国安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 任	刘鸣泰	朱建纲		
副主任	魏 委	吴志宪	田伏隆	王新国
	尹飞舟	龚曙光	唐浩明	
成 员	唐成红	陈祥东	肖 荣	苏仁进
	田方斌	王德亚	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主 任	文选德				
第一副主任	刘鸣泰				
常务副主任	张光华	彭国华	张天明		
副主任	熊治祁	夏剑钦	丁双平	朱汉民	曾主陶
委 员	李建国	易言者	汪 华	刘清华	黄楚芳
	黄一九	胡 坚	周玉波	雷 鸣	王海东
	韩建中	谢冠军	杨 林	章育良	
装帧设计总监	郭天民				

出版说明

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。特别是近代以来，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，以其文韬武略，叱咤风云，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，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，影响深远。为弘扬湖湘文化、砥砺湖湘后人，中共湖南省委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《湖湘文库》大型丛书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以“整理、传承、研究、创新”为基本方针，分甲、乙两编，其内容涵盖古今，编纂工作繁难复杂，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下：

一、甲编为湖湘文献，系前人著述。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，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，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。

二、乙编为湖湘研究，系今人撰编。包括研究、介绍湖湘人物、历史、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。

三、乙编中的通史、专题史，下限断至1949年。

四、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。

五、除少数图书以外，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。

六、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。甲编图书前言，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、该书主要内容、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、所用底本、参校本等。乙编图书前言，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。

七、对文献的整理，只据底本与参校本、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，对底本文字的讹、夺、衍、倒作正、补、删、乙，有需要说明的问题，则作出校记，一般不作注释。

八、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、数字、标点等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一般不作改动。乙编图书中的标点、数字用法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。

《湖湘文库》卷帙浩繁，难免出现缺失疏漏，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前言

戴 维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是余嘉锡先生的代表作，同时也是目录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余嘉锡（1884—1955），字季豫，号狷庵，湖南常德人。其父余嵩庆，字子澂，光绪二年进士，以户部主事出为河南商丘县令，余嘉锡先生即出生于其父商丘令任所。先生幼承庭训，先读完《五经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，继读《四史》《通鉴》，又尽搜家中藏书读之，慨然有著述之志。十四岁，著《孔子弟子年表》，又仿《郁离子》之体著述数万言。十六岁，作《吴越春秋注》。及读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及《輶轩语》，始知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一书，为治学门径，亟思购读之。十七岁，得《四库提要》一部，日夜读之，有疑则发书多方考证，笔于书之四周及行间，第二年即抄录为一册，此为其从事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之始。先生此后为学及著述即依此法，先笔之于书，然后抄录成册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《世说新语笺疏》首附手稿图版，蝇头细批，丹黄满纸，即可见一斑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，先生年十八，中乡式举人，主考为柯劭忞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，为吏部文选司主事，任职数月，即丁父忧回籍守制。随后清廷废除科举，先生不再事举业，就在故乡常德师范学堂执教。民国八年，先生再至北京，经柯劭忞介绍，馆于《清史稿》总纂赵尔巽家，得闻编订《清史稿》之绪论，并且参与审阅初稿。民国十六年，先生夫人去世，回常德料理丧事，亲作墓表。先生伉俪之情极笃，夫人之死，给先生在精神上及生活上均以极大打击。民国十七年，又至京师，寓于常德会馆。其后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推赏，担任辅大讲师，讲授目录学。同时又兼职于北京大学、女子师大等学校。

2 | 一九三一年，先生任辅仁大学教授，兼国文系主任。自十七岁读《四库提要》起，至此已有三十余年，先生一直对《四库提要》考辨不辍，积稿至二十余册，七百多篇，手加改治，缮录成册。至芦沟桥事变起，先生惧此稿之亡佚，遂加删芟，取史子两部二百二十余篇付印为十二卷，此为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最初版本。其间先生曾回乡索居，后又回辅仁大学任原职。

芦沟桥事变后，北京各大学纷纷南迁，辅仁大学因系教会学校，又由日本轴心同盟国德国神甫主持教务，并未南迁，先生也一直在辅大任教授及国文系主任。先生留在日伪区，一边教目录学等课程，一边继续进行《四库提要》考辨工作，但并未忘民族大义。其忧国忧民之心，在《辨证》中时有流露，如卷二十四“心史”条中，先生对此书详加考证，甚至不惜词费，再三再四反复，均致意于不忘国耻，其中有云：“若摘其（指《心史》）一二失误，遂指此数百年来绝仅有之书为伪作，使学者弃置不读，或读之而不敢信，沮后人爱国之心而长勍敌方来之焰，此则吾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也。”又如卷六“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”条，虽为朱子辩护，然字里行间，又多论及夷虏，不忘为华夏之裔，实深

有坚持民族大义驱除日寇之志。

抗战胜利后，先生仍任辅仁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。一九四七年，以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一书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先生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。以后即受到不公正待遇，退居在家，但仍以高龄继续对《四库提要》进行考辨。一九五二年，先生写完《元和姓纂提要辨证》后发病瘫痪。此后即抱病依《辨证》旧稿重加编定，成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二十四卷四百九十篇，一九五四年为之序。计先生自十七岁始从事于《提要》辨证起，至此五十余年，可说是毕生心血尽萃于斯。夏历一九五五年除夕，先生在孤寂中死去，享年七十二岁。

3

余嘉锡先生一生为人处世深受宋儒特别是程朱学派影响，而治学则直承乾嘉朴学，勤愤努力，态度严谨。先生治学著述，于世道人心均有所措意，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二十二“藏海居士集”条云：“吾之著述，欲诛奸谀于既死，不得不贬纤芥之恶，故藉吴可之事以发之，庶使读者知凡人立身一败，万事瓦裂，虽有文章传世，犹不足以自赎云尔。”完全是宋人口吻。先生以目录学名学，在各大大学主要讲授目录学，《目录学发微》《古书通例》就是当时讲义。先生亦曾开设先秦史、经学通论、《楚辞》学、《世说新语》研究等课程，学识弘通，著述丰赡，以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一书为最，另有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。不过，除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在他先前曾出版过史子两部十二卷本外，其他都是在他身后才整理付印的。先生又有《汉书艺文志索隐》《元和姓纂校补》未刊，且其存佚亦不明。

《四库全书》是清代乾隆中期编纂的一部汇萃前代著述的大型丛书，共收书三千四百余种，又将未入选的六千七百余种列为存目。所收各书卷首冠以提要，简述作者仕履始末，以及本书旨趣

得失，由纪昀总其成，编成二百卷之多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于乾隆五十四年写定刊行。《四库提要》既是目录学巨著，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古代学术流变史，学者多赖之。余嘉锡先生对其评价极高，认为它是直继汉代刘向《别录》而超过历代目录学著作的煌煌巨著。但是《四库提要》由于成于众手，不能详核原书及各种版本，又加上总纂纪昀以个人好恶横发议论，故失误亦复不少，但清人格于其钦定色彩，不敢对其多加辩驳。余嘉锡先生化费五十余年心血，对其进行辨证补充，创获极多，终于使《四库提要》更加完善，先生诚可谓为纪氏之诤友。

4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二十四卷，依《四库提要》卷帙书目顺序，将四百九十种书的《提要》的失误或阙疑一一辨析明白或补充完善。引证广博，考辨缜密，是其最大特色。即使将余嘉锡先生置于乾嘉诸大朴学家如钱大昕、卢文弨之间，亦毫不逊色，甚至有凌而上之之势。《辨证》对于一书之作者时代、仕履行实，对于一书之内容旨趣、学述源流，对于一书之版本优劣、卷帙分合等情况，无不广为疏引，考辨详明。有时引书达数十种之多，详为按检，不作空言。其所引用资料都是他自己于浩瀚群籍中披寻所得，并非稗贩而来，如果前人已对此资料有所引证，必标举前人之名，以示不掠美抄袭，然后再加补充考辨。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一书中，精采纷陈，令人有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。如卷十五“云麓漫抄”条，《提要》于作者赵彦卫仕履考之不详，余嘉锡先生则广引《宋史》《说郛》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《潜研堂金石跋尾》《读书杂识》《宋会要》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诸书，对赵彦卫之仕履行实钩勒明晰，既辨证了《提要》所云赵彦卫“其所终则不可考”，又补充了《提要》之所阙。从其所引书的数量，就可见其知识之广博，考证之详实。而关于赵彦卫与韩

侂冑关系的考证，更让人叹为观止。先生从《宋会要》诸书中考知赵彦卫仕履年月，又知赵彦卫有请禁《继通鉴长编》诸私史之奏，但诸资料中并无赵彦卫与韩侂冑有关系的任何一点文字记载，先生从蛛丝马迹中推论，认为：“彦卫之奏禁诸史，其必有故矣。按彦卫仕宦于庆元、嘉泰、开禧之间，皆韩侂冑专权窃政之时也。虽蕞尔小官，未必与侂冑有何关涉，然尝为御史林采所劾罢。林采者，以攻击伪学，久居言路者也，则其不容于侂冑之党明矣。乃不居二年（原注：由庆元六年四月放罢，至嘉泰二年二月知随州），已起徒步，馆郡符。当侂冑威福自恣，贿赂公行之日，果以何道而致此耶？私史虽多，于国计民生有何大关系，且亦何与外郡牧守事？而彦卫亟亟建言，惟恐毁灭之不尽，此必因当时人之语录家传，纪述时事，为侂冑所恶，彦卫乃为此奏，以献媚权奸耳……数年之间，彦卫又换守徽州矣。随乃边境僻郡，徽则东南大藩，且中书堂除十五阙之一也，若非自结权臣，安能得此于庙堂乎？自此以后，彦卫姓名，遂不见简牍，《兰亭考》称之为赵徽州，盖官止于此，疑其与侂冑俱败矣。”余嘉锡先生若不详悉当时之时事，又怎能从蛛丝马迹中考辨出赵彦卫这种深湮历史尘埃中的情实呢？知其人论其世、知其世论其人，先生正是以这种科学实在的方法进行考辨，才取得如此惊人成就。又如卷三“宋书”条，《宋书·少帝纪》在废黜少帝时有皇太后令“一依汉昌邑、晋海西故事，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篡皇统”云云，明刻本、清武英殿本均如此，而涵芬楼影印刘氏藏宋蜀大字本本页最后数字为“一依汉昌邑、晋海西故事镇”，多一“镇”字。语气未完，实有缺页，张元济在作跋是如此认为，并以为经后人拼接而成明清刻本式样。马宗霍在晚年作《南史校证》时，依据《册府元龟》，补全此皇太后令之缺。马先生甚以此为大发现，其实余嘉锡

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依《建康实录》卷十一将皇太后令补充完全，并不以此沾沾自喜，仅小注数行而已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这种重大发现实在太多了，故先生能淡然待之。

《四库全书》据以著录者多为宋元旧刊，而《提要》中据以为说者又是另一俗本劣本，故踳驳不少。余嘉锡精于版本之学，深知其优劣，他能从一书的各种版本中发现其篇目多寡卷帙分合等情况，甚至考辨到一些重大事件。如卷二十“寒山子诗集二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”条，《提要》云：“《唐书·艺文志》载寒山子诗人释家类，作七卷，今本并为一卷，以拾得丰干诗别为一卷附之，则明新安吴明春所校刻也。”余嘉锡先生通过对比各种著录及版本，最后下结论云：“此书唐人所辑，宋人所刻，皆只一卷。《唐志》作七卷者，盖本寂作注时之所分也。《提要》既不考《宋高僧传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又未见宋刻，遂以一卷之本为明人之所合并，其误甚矣（原注：《丛刊》第二次影印，系用《天禄琳琅后编》所载宋本寒山诗至三百十三首，盖最足之本，然亦只一卷）。”余嘉锡先生多引用宋本，但并不佞宋，其书斋名“读已见书斋”就昭示了这一点，惟善者用之。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一书引证之博，考辨之精，是与余嘉锡先生治学之思想与方法分不开的。余先生最服膺者是章学诚论刘向、刘歆父子所说的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八字，同时先生书斋名“读已见书斋”，隐含了两层意思：读普通易见书，重读多遍，这也揭示了先生为学之旨趣。所以先生作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并不是一味辨证，而是能上升到理论层面，他在三十年代著《目录学发微》及《古书通例》，就是其辨证工作上升到理论的表现。同时，先生又能以其理论来指导其辨证，这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有精采的阐述与实践，如卷十八“山海经”条，前人以书中地名有用

后世之名者，遂疑其为贗托，余先生以为：“是书虽有秦汉之地名，不害其为三代以前之书……余尝以为秦汉以前人纯朴，故于官制地理，多用当时之名，以期合乎实用，六朝以后渐趋浮华，故多用古代之名，以求益其色彩，此不但所作诗文如此，其于典籍也亦然，故秦汉以前书，点窜以从今，六朝以后书，模拟以贗古。而后之考据家摭拾字句之间以求之，从而定其著作之时代，是何异于刻舟以求剑哉……故古人之著作，皆不署名，凡诗文书画篆刻词曲之在萌芽时期，莫不皆然。又况六国以前之六艺九流乎……章氏学诚有言公之篇，余于《古书通例》中言之详矣。凡古书有后人续入者，以历史地理书为多，议论文则少见，盖实用与空论之别耳。”对比二十世纪上半叶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派，由于其昧于古书通例，故将《老子》诸书均断为伪书，余嘉锡先生显然要高明一些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前有序录，而无凡例，书中虽有两三处“发其凡”云云，实则《目录学发微》《古书通例》即其凡例也。《发微》《通例》是《辨证》之精魂，《辨证》亦是《发微》《通例》之骨血。如前所引考辨赵彦卫与韩偓胃事，就是先生知人论世理论的具体应用，而此理论在其《目录学发微》卷二《叙录》篇中有高度概括：“吾人读书，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，其生平行事若何，所处之时代若何，所学之善否若何者，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。”随后详为推演其说。他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，显然高于乾嘉学派一味考辨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作法。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虽考证精博，但亦微有小失。《提要》总纂纪昀，主张汉学，不喜宋儒，故在《提要》中对宋儒特别是朱子大加抨击，横生议论，余先生对此极为不满，大加挾伐，多为朱子诸人辩，这本不错，但如果矫枉过正，则自陷于门户之争。如

《辨证》卷六：“始兴十八年同年小录”条，《提要》所论，本不为大过，而余先生云：“此盖纪晓岚之徒，深忌宋儒，故无端至其讥笑。”其言甚为激越，不能平情而论。凡《提要》中议及宋儒之处，先生均抨击不遗余力，大发议论，而忘其考证。这不能不看作是《辨证》之误。另外，在考证时亦有小疏，如卷十二“五曹算经”条，余嘉锡从《唐书·选举志》“《孙子》《五曹》，共限一岁，《九章》《海岛》共三岁，《张丘建》《夏侯阳》各一岁，《周髀》《五经算》各一岁，《缀术》四岁，《缉古》三岁”认为：“考《九章算术》为魏刘徽注，《海岛算经》亦徽所作，本附《九章》之后。唐制限令共习，盖以二书本出一人，互相表里，故令共习，以期贯彻。《孙子》《五曹》亦同斯例。推此而言，适足证《五曹》与《孙子》为一人所作。”其实共限一岁，即各半岁，共限三岁，即各一岁半，其余均为整岁，此四者则不然，故共限仅以难易时间分，不以作者言，实不能据此证《孙子》与《五曹》必为一人所作。又如卷十八“搜神后记”条，《提要》云：“陶集多不称年号，以干支代之，而此书题永初、元嘉，其为伪托固不待辨。”以陶集多不称年号证《搜神后记》题陶潜撰为伪托，显然有误，翻检陶集即可见陶氏题年号之处不少，余先生列《提要》此文而辨托名远在《隋志》以前，而不辨陶集不称年号之误，亦偶疏也。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于一九三七年自印出版其史子两部十二卷二百二十余篇，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二十四卷本，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据科学出版社版标点排印，后来云南出版社等又依中华版重印。这些版本均为繁体竖排。今依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版改为简体横排，其中别体字均径改为正体，又依《湖湘文库》点校条例校正若干讹误衍脱之处。另外其目录中小字注而正文标题未有者，一律依旧式不加统一。

上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经部二卷，史部七卷，子部十卷，集部五卷，武陵余嘉锡季豫甫之所作也。嘉锡束发受书，先君子自课之，先君子讳嵩庆，字子激，光绪丙子进士，以户部主事出为河南知县，官至湖北候补知府。著有《缉芳仙馆诗词钞》、《借酒集》、《豆棚琐议诸书》，稿藏于家，多为日寇所毁。常坐之案头，口授章句，《五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既卒业，即命观四史、《通鉴》，学为诗古文，不令习时艺也。嘉锡颇知嗜学，发簏中书尽读之，目为之眚。小子狂简，遂斐然有述作之志，年十四，作《孔子弟子年表》，读《郁离子》，好之，效其体著书数万言；十六岁注《吴越春秋》，然于学问之事，实未有所解。阅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，骇其浩博，茫乎失据，不知学之所从入，及读其《辘轳语》曰：“今为诸生指一良师，将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读一过，即略知学问门径矣。”不禁雀跃曰：“天下果有是书耶！”间

请于先君子，为道其所以然，意欣然向往之，遂日求购读。光绪二十六年庚子，年十有七矣，先君子以事于长沙，始为购得之，则大喜，穷日夜读之不厌。时有所疑，辄发篋陈书考证之，笔之上方，明年遂录为一册，此余从事《提要辨证》之始也。尔后读书续有所得，复应时修改，密行细字，册之上下四周皆满，朱墨淋漓，不可辨识，则别易一稿。如此三十余年，积稿至二十餘册，自期以没齿乃定，故未尝出以示人。岁在辛未（一九三一年），忽慨然动念，惧其放失，始发愤铨次先后，删除重复，编为目录，合经史子集四部，凡得七百餘篇。其间尚多少作，见闻不广，读之令人惭，遂以暇时，稍加改治，手自缮录。然迫于讲课，扰于人事，或十许日不能终一篇，辄复投笔叹息。自念平生于经部所得不深，集部自荦荦数十家外，可传者少，其书汗牛充栋，读之未遍，未易妄加论定；惟史、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，元、明以后，亦颇涉猎，因就两部芟定之，旧稿以外，复有增益。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甫经写出十之五六，忽又因病辍业。七月卢沟桥事变起，日寇侵入北京，人益困顿忧苦，殆岌岌不可终日。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，世变日亟，马齿加长，惧亡佚之不时，杀青之无日，乃取史、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餘篇排印数百册，以当录副。尔后续有修改增益，寢寢加多。从一九三七年直至一九五二年，十五年之间复先后写定经部稿六十餘篇，集部稿百餘篇，史、子两部稿百余篇，凡二百六十餘篇。盖自初读《提要》以来，五十餘年之久，惟此二十餘年治之最勤。然中间三次大病几死，至今手足尚时时麻痹不仁，意志虽勇，欲续有述作，而精力就衰，不足以副之矣。是以旷日持久，而其所成就者如是其少也。犹忆革命胜利以后，一九四九年之冬，以考证《东林点将录》及《天鉴录》二书用思过度而罹疾，病剧之时，第觉病榻之前后左右所

陈列者莫非书也。迨病愈，而考索愈力，未及终篇，忽转为风痹，卧床数月始愈。自是以后，精神疲顿，虽发愤撰述，早兴夜寐，手自抄录，但以右臂麻痹，手颤作书不易，往往经一月始成一篇。至一九五二年秋，写《元和姓纂提要辨证》稿成，忽跌损右股，转成瘫痪，脑力益衰，遂不复能有所述作矣。每念及此，辄为之神伤。自顾平生无用世材，惟以著书为事，此稿既为一生精力所萃，于他人或不无裨益，未可任其废置，因重加编定，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，依《四库提要》原书目次排列，汇为一书，以就正于当世。倪蒙告之以所闻，而匡其不逮，则是区区之愿也。

闲尝论之，乾、嘉诸儒于《四库总目》不敢置一词，间有不满，微文讥刺而已。道、咸以来，信之者奉为三尺法，毁之者又颇过当。愚则以为《提要》诚不能无误，然就其大体言之，可谓自刘向《别录》以来，才有此书也。《别录》亡矣，今其存者，八篇而已。班固尝称刘向校书，每一书已，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；又云刘向司籍，辨章旧闻。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，又从而撮取其指意，岂易言也哉，非博通如向，不足以办此。向子歆继父之业，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今观诸书所引，已不能如《别录》之详，若固之《艺文志》，特《七略》之要删耳。其后荀勖、李充之徒，代有簿录。王氏《七志》、阮氏《七录》，又复继轨向、歆，然《隋志》率讥其不述作者之意，浅薄不经。盖著录之事，如此其难也。唐元行冲等撰《群书四录》，同时修书学士毋巽已议其不能精悉，今遂只字弗传。宋之《崇文总目》，多所谬误，晁公武语。复残缺失次。晁氏《读书志》、陈氏《解题》，粗述厓略，鲜所发明。杨士奇以下，又不足算也。今《四库提要》叙作者之爵里，详典籍之源流，别白是非，旁通曲证，使瑕瑜不掩，淄澠以别，持以向、歆，殆无多让；至于剖析条流，斟酌今古，

辨章学术，高挹群言，尤非王尧臣、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。故曰自《别录》以来，才有此书，非过论也。故衣被天下，沾溉靡穷，嘉、道以后，通儒辈出，莫不资其津逮，奉作指南，功既巨矣，用亦弘矣。虽然，古人积毕生精力，专著一书，其间牴牾尚自不保，况此官书，成于众手，迫之以期限，绳之以考成，十馀年间，办全书七部，荟要二部，校勘鲁鱼之时多，而讨论指意之功少，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馀种，编辑佚书数百种，又于著录之书，删改其字句，销毁之书，签识其违碍，固已日不暇给，救过弗遑，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？且其参考书籍，假之中秘，则遗失有罚，取诸私室，则藏弃未备，自不免因陋就简，仓卒成篇。故观其援据纷纭，似极赅博，及按其出处，则经部多取之《经义考》，史、子、集三部多取之《通考·经籍考》，即晁、陈书目，亦未尝覆检原书，无论其他也。及其自行考索，征引群籍，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。隋、唐两《志》，常忽不加察，《通志》、《玉海》，仅偶一引用，至宋、明《志》，及《千顷堂书目》，已惮于检阅矣。甚至颜叔秉烛，不知出于《毛传》；见《蒙求集注》提要。蜎称缙女，不知出于《尔雅》；见《异物汇苑》提要。作《论衡》之王仲任，不知有传在《后汉书》；撰《家训》之颜之推，不知已见于《北齐史》；马迁之《史记》，谬谓尝采陆贾《新语》；胡炉之《拾遗》，未觉全抄《困学纪闻》；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，其他疏漏，复何待言。颜之推曰：“观天下书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黄。”《家训·勉学篇》。此虽名言，其实难副。然董遇谓“读书百遍，而义自见”，《魏志·王朗传》注。固是不易之论。百遍纵或未能，三复必不可少。《四库》所收，浩如烟海，自多未见之书。而纂修诸公，絀于时日，往往读未终篇，拈得一义，便率尔操觚，因以立论，岂惟未尝穿穴全书，亦或不顾上下文理，纰缪之处，难可胜言。又《总目》之例，仅